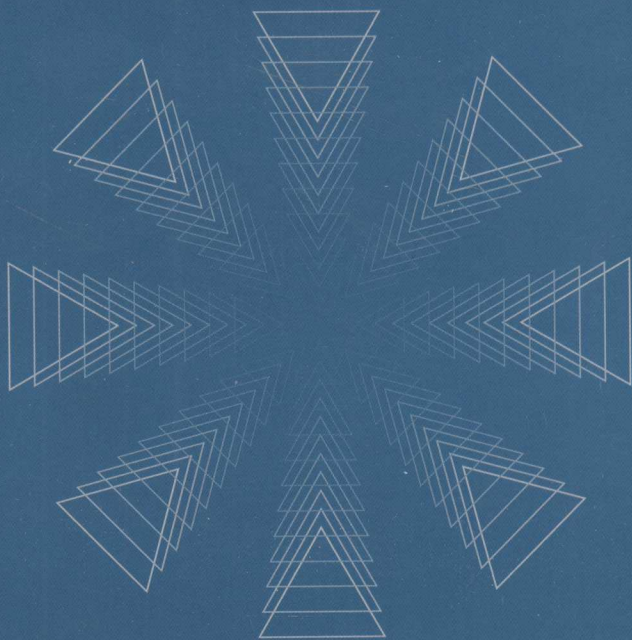


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认知隐喻翻译研究

张光明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认知隐喻翻译研究

张光明 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以英语和汉语隐喻差异为研究对象的。英、汉隐喻差异表现在各种语体之中,除了主要突出各种文学体裁,如诗歌、散文、小说等隐喻比较研究之外,也注意到了它们在其他文体中的表现,比如在科技类的文章中,在应用文,如广告、演讲中,因此也对一些典型的译例进行必要的剖析。本书主要集中研究词、短语、句子、话语和篇章层次上的隐喻修辞现象,尤其是短小精悍的完整句子,这样既可以节省篇幅,又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掌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隐喻翻译研究/张光明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2

(翻译研究新探索丛书)

ISBN 978-7-118-06718-7

I. ①认... II. ①张... III. ①英语—隐喻—翻译—
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6352 号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 $\frac{1}{2}$ 字数 259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中西修辞学研究回顾与比较	5
第一节 修辞学研究回顾	5
第二节 中西修辞学研究相近相异之处	12
第三节 二十世纪中西修辞学研究的新进展	18
第四节 英汉修辞上的文化差异及研习策略	22
第三章 英汉比喻研究比较	25
第一节 英汉比喻研究简述	25
第二节 英汉比喻论述之异同	28
第三节 英语 metaphor 与其思维方式	30
第四节 汉语比喻及英语 metaphor 之分类	32
第四章 隐喻研究	49
第一节 东、西方隐喻(学)研究简述	49
第二节 英、汉语言中的概念隐喻	61
第三节 隐喻是人类思维及认知的普遍方式	63
第四节 不同的物质文化决定着人们的思维定势	65
第五章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解析隐喻	70
第一节 传统隐喻观	70
第二节 相互作用隐喻观	73
第三节 语义学隐喻观	80

第四节	认知隐喻观	82
第五节	语言中的隐喻	85
第六章	从美学角度解析英汉比喻之异同	90
第一节	英语比喻之美学因素	90
第二节	英汉比喻美学考量之差异	92
第三节	从接受美学看译本的多样性	99
第四节	比喻性词语翻译的基本途径	109
第七章	从和谐论视阈解析英汉比喻之谜	114
第一节	和谐论的提出与回顾	114
第二节	国内和谐论研究综述及展望	116
第三节	国外和谐论研究概览	117
第四节	和谐论视阈下的英汉比喻翻译之道	118
第八章	英汉形体及五官比喻研究	129
第一节	英汉形体五官等喻体、喻义比较	129
第二节	英汉身体其他部位喻体、喻义比较	140
第三节	英汉形体比喻及其翻译策略	144
第九章	英汉语动物词汇比喻研究	149
第一节	英汉语动物喻词的表达形式	149
第二节	动物喻词及英汉语主要隐喻差异详析	150
第三节	英汉语动物隐喻的翻译策略	178
第十章	英汉转喻认知形式研究	181
第一节	英汉语转喻定义与分类	181
第二节	转喻、明喻、隐喻之间的比较研究	196
第三节	英汉转喻差异及对翻译的影响	201
第四节	英汉转喻互译的策略	204

第十一章 英汉明喻认知形式比较研究	208
第一节 as 认知方式的人本性特质	210
第二节 英语的 simile 与汉语明喻的分类	212
第三节 英汉明喻认知形式的翻译策略	229
第十二章 英汉语拟人认知形式的比较研究	232
第一节 英汉语拟人的定义及分类	232
第二节 英汉语拟人的形式及功能	238
第三节 英汉语拟人与其他喻类形式的比较	242
第四节 英汉语拟人形式的翻译策略	243
第十三章 影响隐喻翻译策略的因素	251
第一节 文化差异因素	251
第二节 隐喻心理差异因素	254
第三节 英语 metaphor 和汉语比喻的翻译策略	256
第四节 翻译应变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261
第十四章 结语	264
参考文献	265

第一章 绪 论

一、概述

隐喻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肇始了西方隐喻的修辞学传统,他认为隐喻是根据类比的原则所作的隐性比较(implicit comparison),是一种修辞格。这一理论影响并统治了以后几个世纪的隐喻理论。二十世纪的学者从修辞学、心理学、文学批评、符号学、人类学、语言哲学等角度对隐喻进行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探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出现了隐喻的研究热潮,这一段时期隐喻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其研究的多学科性。语言学家、哲学家、符号学家、心理学家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

无论是印欧语系中诸多语支之一的英语,还是汉藏语系里最大语种的汉语,使用隐喻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使用隐喻,在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幽默中,作者也大量使用隐喻。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曾经说过: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波里奥、帕娄、帕恩等人(Pollio, Barlow, Pine, 1977)也估计说,人们在自由交谈中平均每分钟使用四个隐喻辞格。

我们中国人也对隐喻十分偏爱,且使用得非常普遍。古代文论中对隐喻运用也多有论述,如陈骥《文则》中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

不过,在谈论英汉语隐喻时切不要忘记,英文中的隐喻与汉语中的隐喻所涵盖的范围有很大不同。英文的隐喻包括明喻以外的所有汉语比喻方式,比如“转喻”、“潜喻”、“缩喻”、“事喻”、“物喻”等。这部分解释了西方隐喻热的原因,因为它不仅使用范围广,而且与人们的生活联系也十分密切。

关于汉语中的隐喻,通常置于修辞总目下论述。汉语中的隐喻范围虽未及英语广泛,但其所发挥的作用却同样十分重要。在讲到隐喻时,往往将其作为众多修辞格中重要的一种进行详细讨论。

二、研究对象

本书所涉及的隐喻涵盖内容较为宽泛,即英语 metaphor 和汉语比喻所包括的内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六点:

(1) 原作所使用的隐喻(或其他)形式与内容的分析方法,即如何把握作者的意图、如何分析作者在特定情境、对特定对象传达信息时所采用的语言手段的选择艺术;

(2) 译作的隐喻(或其他)与内容与原作有何不同,译者的动机、理解及传达特定信息时的艺术表现手法;

(3) 翻译隐喻(或其他)形式的标准,翻译隐喻(或其他)形式中的遣词造句、辞格的选用以什么为依据和指导原则;

(4) 翻译隐喻(或其他)资源的系统描述;

(5) 对翻译隐喻(或其他)形式或矛盾的处理,即在翻译的语言手段选择中,作者意图和译者意图、原作情境和译作情境、原作读者和译作读者,原文修辞资源和译作修辞资源等一系列矛盾的处理方法;

(6) 概念隐喻与修辞隐喻的区分和处理等。

本书是以英语和汉语(均以现代语料为主,古典文学译例为辅)隐喻差异为研究对象的。英、汉隐喻差异表现在各种语体之中,除了主要突出各种文学体裁,如诗歌、散文、小说等隐喻比较研究之外,我们也适当注意到了它们在其他文体中的表现,比如在科技类的文章中,在应用文,如广告、重要演讲等,因此也对一些典型的译例进行必要的剖析。本书主要集中在研究词、短语、句子、话语和篇章层次上的隐喻修辞现象,尤其是短小精悍的完整句子,这样既可以节省篇幅,又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掌握。

研究认知隐喻,国外学者已经把它当作一门重要的学问,我们国内在这方面则刚刚起步。本研究与其他学者所进行的专门隐喻学研究有所不同,本书的侧重点是认知隐喻的英汉对比与翻译,换言之,首先对两者的异同进行比较与对比,二是在此基础上论述翻译实务,少讲抽象的隐喻理论,只是画龙点睛地将理论穿插于大量译例之中。当然为了把问题讲清

楚,我们仍然需要对古今中外关于隐喻的研究、观点、理论、历史沿革等进行一定的梳理,否则难以理清脉络。梳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代、当代隐喻的比较、对比与翻译研究。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权作近期目标):从事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同仁,其注意力一般都放在既要有理论的高度,又要有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论述,易言之,要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笔者研究隐喻以宏观论述隐喻及相关内容开始,围绕翻译这一核心而展开,落脚于翻译策略的具体运用。要想把原文译得出彩,首先要弄懂原文中隐喻的深刻含义,它与译入语貌似相同的隐喻有何差异,是貌合神离相去甚远,还是貌离神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要译得“神似”,译得出彩,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功力?首先要攻破理解这第一道难关。研究英汉隐喻差异与翻译,除了详细探讨英汉修辞及修辞格的异同外,还要在更深的层次即文化差异上理解好源语句子,然后才有可能在译文中忠实、顺畅地表达出来(作为一名译者,应该如何根据当时、当地的交际实际,恰如其份地译出隐喻认知形式中所蕴含的意义,译出风格之间的细微差别)。

三、研究内容

本书研究的内容范围集中在与隐喻有关的研究及翻译方面。第二章将简要介绍中西隐喻的不同发展、历史沿革和各自的发展特点,第三章介绍比喻子范畴的具体分类,这里涉及英语 metaphor 与汉语比喻的比较与对比,比如 metaphor 与汉语的转喻、博喻、倒喻、进喻等方面的异同,探讨它们之间有哪些相近、相似及相异之处,只有厘清其中的主要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各自语言的妙处。第四章正式讨论隐喻问题,将会分节介绍西方隐喻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及进展情况。第五章介绍西方认知隐喻的主导理论与观点,先从传统隐喻理论展开,然后介绍交互作用理论,语义隐喻理论,语言中的隐喻,符号学理论,认知隐喻理论及和谐理论。第六章讨论美学与隐喻等所构成的各种关系。第七章集中探讨具有悠久历史但又寓于新意的和谐哲学思想对隐喻研究的启示,和谐论可运用一切学术领域,毫无疑问,它也能够指导我们的翻译和隐喻研究,当然,本书用此理论还只是初步的探讨。第八章探讨与人密切相关的隐喻,这是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领域,其中有些内容人们虽然较为熟悉但不一定明白其中的

奥妙,有些隐喻,人们甚至还不一定非常熟悉,所以很有探讨的必要。第九章探讨中国读者抑或熟悉抑或根本不熟悉的动物的隐喻,这些对我们以英语为外语的读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本部分的介绍将把我们领进另一个领域。第十章深入探讨英汉转喻修辞格的比较与翻译。第十一章用一章的篇幅从各相关理论的不同视角,探讨英汉明喻修辞格的比较与翻译。第十二章,也是人们常用的隐喻手段之一的拟人,我们将深入探讨英汉拟人修辞格的比较、对比与翻译。第十三章集中探讨影响隐喻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充分认识不同文化所产生的差异,透过隐喻的心理差异认识文化深层的内涵,分析它们的具体运用和作用,以期提高翻译变通能力。第十四章是对本书所探讨问题的一个小结。

四、研究方法

本书主要采用比较和对比方法,对英汉认知隐喻在各种条件和方面的运用进行较有系统的比较和对比,分析其相同与相异之处。希望通过使用者在对这些隐喻手段进行解读时可能产生的思维过程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力求找出产生异同的主要原因,从而理出一些可资借鉴的规律。这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本书希望能够在本领域有所突破的主要方面。正如束定芳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学者对隐喻研究的真正贡献恐怕应该是通过对汉语隐喻特征的研究和考察,通过对汉语隐喻与其他语言中隐喻的对比研究,为建立隐喻的一般理论提供更有力的、甚至是独特的依据。(束定芳,2000:2)此外,对大量的例子,本书也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希望通过这些方法能为我们认识隐喻和翻译提供一些有益的尝试。

第二章 中西修辞学研究回顾与比较

第一节 修辞学研究回顾

在中西修辞学中,比喻是最基本、最古老、研究最为广泛的一种修辞格,也是各民族语言中人们最乐于使用、且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修辞格。(胡曙中,王希杰)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比喻能“喻深以浅,喻难以易”(王充《论衡·自纪》),能把“印象增大增深,用两种东西的形态或性质,使读者的心中多了一些图景”(老舍),“Metaphor 使我想到的两样不同的东西在共同起作用。”(理查兹)比喻的多种作用已受到不同学科学者的重视,因此也成了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修辞学家、符号学家等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从起初作为最重要的修辞格进行研究,发展到语言性质甚至对思维性质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学者们认为,它不仅是诗学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它还广泛涉及到一般语言的使用问题和科学思维的模式性质问题。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比喻只是诗歌想象力和使用华丽词藻的一种手段。这一认识的局限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日益突显,因此急需时贤努力予以改变。对比喻研究稍作历史的回顾和分析,比较各家学说,并试图综合诸理论对比喻提出较新的界定,对深入研究很有必要。传统的比喻理论将比喻看作是一种语言现象,具有修饰功能。当今许多学者认为,比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从本质上讲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思维活动方式。为了更系统地论述比喻,我们拟对中西修辞学研究作一鸟瞰式回顾。

一、修辞立其诚与修辞诡辩术

汉语修辞学,从肇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诚”字为先。《周易》中《乾·文言》写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

居业也。”“修辞”作为该领域的专业术语,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所引之书是首次提出来的。陈炯认为,纵观《周易》中“修辞立其诚”之文化内涵,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 修辞与道德、诚实密切相关。

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为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根据孔氏解释,“修辞立其辞”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内心,诚心诚意,心诚才能立言,修辞才能站住脚根;二是在外,在外要起到教化和感化作用。内外相融,内外相辅,则功业可居矣。

(2) 修辞与修身密切相关。

既然修辞贵在“诚”,那么“诚”从何来?肯定来自立言者的自身,即立言者必须心正、身正,只有修身才能立言,才能立身处世。明代宋濂在谈到“修身”与“修辞”的关系时说:“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决不可改矣。”(《文说·赠王生黼》)章学诚也认为:“《易》曰‘修辞立其辞’,诚不必于圣人至诚之极致,始足于当于修辞之立也;学者有事于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特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言公》)他把修辞看成是一种工具,工具要好,使用工具者的修养、意识更要好。(转引自陈炯:286)修养是第一性的,修辞是第二性的,不能本末倒置。

(3) 修辞主指修饰言语文辞。

许慎《说文解字》上说:“修,饰也。”“辞,说也。”《论语·宪问》也指出:“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修辞立其诚”句中的“修辞”是动宾结构,是指修饰言辞,后又发展到修饰言语文辞,即要使文辞流畅、优美。

而在西方,修辞起初主指如何提高论辩技巧,即只是取得某种修辞效果的一种词汇手段。西方修辞学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

在古希腊修辞极受重视。现在英语中使用的 rhetoric(修辞学)与古希腊语有直接的渊源关系。rhetoric 一词一般都译为“修辞学”,它在西方曾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是被看作值得认真研究的艺术之名称。它与汉语的“修辞”或“修辞学”都有很大的不同。rhetoric 的字根“rhe”,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口头上使用的语言”,内容涵盖面较为广泛,包括声调、

动作、表情等辅助性动作的“全方位”说话,与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的意思较为接近。这是该词的最初含义。“rhetor”的意思是“使用语言的人”。

1. 修辞与演讲有关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里, rhetoric 一般都指具有说服性质的论辩演说(persuasive rhetoric)。说服的手段与技巧与语言的风格问题息息相关,而风格又是建立在辞格基础之上的。换言之,说服的“目的”必须依靠辞格这些充当手段或技巧的媒介才能完成,易言之,说服是目的,而辞格只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

人们熟悉的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指的古希腊罗马修辞学传统。修辞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古希腊直到公元前五世纪才开始形成。一般都认为柯拉斯(Corax, 539BC—443BC)与其弟子提西阿斯(Tisias)是西方修辞学的创史人。柯拉斯把“rhetorician”定义为以“说服”为目的演说人。他提出,一篇演说应当有四个部分:引言、说明、申论和结论。可能性(或可信性)(probability)(即有可能是真的)这个概念是演说的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

probability(可能性)是区别于 logic(逻辑)的主要特征。这是“修辞”语言同“逻辑或科学”语言的关键区别。换言之,如果前者以“可能性”为其论说的出发点,那么后者则以“真实”(或必然性)为其立足点,两者在此问题上的对立也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争论焦点之一。

埃苏格拉底斯(Isocrates, 436BC—338BC)可能是早期希腊演说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家。埃氏似曾师从提西阿斯,后来主要以授学为业。埃氏道德意识强,并且有着高尚的教育信念和理想。他教授的“修辞”课程,成为培养学生品德和智力的专修课。埃氏认为,好的演说必须做到:适合情意与题旨;要具有新颖独到的见解;除了演说技巧,必须充分考虑到道德观念;兼顾文学、哲学等方面的文化修养。埃苏格拉底斯对语言的作用认识也深为后人所乐道。他指出:语言是使人变得文明起来的动力,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语言是人们表达睿智、洞察力的唯一手段。埃氏关于演说道德等观点对后来的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Cicero, 106BC—43BC,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与昆体良(Quintilian, 35—96, 古罗马修辞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修辞与论辩相关

与埃氏同时代的柏拉图(Plato, 428BC—348BC)被后人尊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泰斗人物。很多学者都认为,后来西方哲学中的许多重要思想都在柏拉图的著作里初露端倪,甚至有人提出,柏氏之后的西方哲学不过是对他的思想的详细注释和补充完善而已。柏拉图是苏格拉底(Socrates, 469BC—399BC)的学生。柏拉图那部很有名的《对话录》,有很多篇是记录其师苏格拉底与他人论辩进行一问一答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柏拉图与其师苏格拉底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苏、柏师徒对修辞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柏拉图认为修辞是讨好听众的雕虫小技,是讨好听众的阿谀美词。修辞根本不能称作是艺术,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对于演说家,柏拉图也提出了基本的标准,用智慧来统领修辞,要求把修辞看作是引导人们的灵魂向善的艺术,达到了这个标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修辞家。他对演说修辞也提出了具体标准:修辞学家对演说题目要有较充分的了解,要有专业知识;演说对象不是一般听众,而是诸神(to speak what is pleasing to the gods)。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和偏见态度,后来在其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纠正。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BC—322BC)是古典希腊文化承前继后的人物,他将以前的遗产进行了系统整理,使学问的探讨系统化,提出了必要的方法论。亚氏的《修辞学》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被称之为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奠基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用很大篇幅对 metaphor 进行了阐发。在他看来,metaphor 只是取得某种修辞效果的一种词汇手段(a lexical means)。亚氏认为,metaphor 是某种碰巧为各词或物命名的东西。他把 metaphor 看作是意义的转换,这种转换可在几个层面上发生:从种属到类属,从类属到种属,从类属到类属(from genus to species, from species to genus, and from species to species)。然后 metaphor 转换也关系到意义转换,这种转换是在类比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这一关系之上。(Aristotle, 1954:166—169)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他对 metaphor 所进行的粗略分类。由此看出,亚氏是从宏观上来研究 metaphor 的,因为其他修辞学家把上述四种情况的前两类分别看作是转喻(metonymy)或提喻(synecdoche)。亚氏的第四种分类才与大多数修辞学家所认为的 metaphor 内容相一致。

把 metaphor 限制在词级修辞范围内的优点是:这样做就有可能提出一个非常有序的分类法。而这一点正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传统修辞学家们所努力去做的。古典 metaphor 修辞理论的最突出特点是,他们只关注词汇言语的基本单位,即“词(汇)”这一层面。不过,这样做也造成了不良后果,没有认识到 metaphor 不仅可以在语言的词级,还可以在句级、话语级、篇章级和整篇风格等所有层面上发挥作用。作为语义转换的手段,metaphor 不仅是可以由名词、动词组成的语义单位,而且也可以是包括句级和话语级在内的所有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

3. 修辞与诡辩相关

在西方,修辞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诡辩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修辞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诡辩术。古希腊人为了能在法庭上打官司时战胜对方,常常由人代笔,极尽花言巧语之能事。法庭陪审员也常常忽视证据和事实,过多相信诉讼人的巧语利辩。盛永生在《修辞价值观的文化阐释》中指出:“为争取诉讼的胜利,撰写演讲稿和讲授论辩术便成为一些语言学家的专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时需要辩才如此之普遍,培养论辩能力如此受人欢迎了。从中可以看出,西方修辞学的诡辩术特质,是与当时社会的大量需求密切相关的。“一些修辞学家为迎合这种社会需求,他们在讲授修辞学时不顾真理和正义,只图以巧妙的言辞和虚伪的论证来战胜对方,因而把修辞学当成强词夺理颠倒是非的诡辩术。到第二世纪诡辩派在诡辩术上越走越远”,致使“修辞学的声誉大受损害”。(陈炯:285)

从以上简单回顾,可以看出传统中国修辞与西方传统修辞的根本不同,中国修辞讲究以诚为根本,而西方修辞学却“不关善恶真妄,这种不出于‘诚’的修辞学,到底对人生有何益处呢?(黄庆萱《修辞学》)从创始之初,中国修辞就带有明显的劝人向善的伦理色彩,而西方修辞学仅关注论辩技巧。

二、中国修辞的劝善重德与西方修辞的劝说重艺

中国古代修辞从其创始之日起就很重视德的修养。孔子明确指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失“仁”乱“德”的巧言,是过分华丽的言辞,应该摒弃之。《吕氏春秋》认为,至治之世,

“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强。”（转引自陈炯：287）东汉王符主张：“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诡丽为末。”（《潜夫论·务本》）即是说，修辞始终应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倡导正义之举为根本，不应以狡诈的技巧、不实的事实，哗众取宠。

梁代刘勰在其鸿篇巨著《文心雕龙》中论述作者品德与文采时明确指出：“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文心雕龙·程器》）（周振甫今译：看看那些从前的贤人，具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声名和文采扬溢在南方的楚地，文采和声名震动了北面的梁国。假使光有雕饰文采而没有品德，才具不够还能做谁的榜样？难道文章没有显耀身名，也有为国争光吗？）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贤们大都非常重视品德与文采这一对关系，品德始终应是最重要的，高尚的品德，辅之以恰当的文采最为理想。

反观西方修辞学，起初是以论辩始，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修辞学在诡辩术的斜路上差一点走进了绝路。直到中世纪，一些修辞学家才逐渐重视修辞学的劝学功能，再现了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看作是一种劝说功能和宣德演讲的思想。

中世纪的奥古斯丁（Augustin）在《忏悔》一文中明确表示对诡辩修辞学派的唾弃，强调指出，传教士应该把修辞学者看成是劝人向善的方法，而不是一种表现、炫耀的方法。到十七世纪末，传统的修辞学与历史、诗歌、文学评论和美文学密切联系了起来。胡曙中指出：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评论家认为，文学的目的性很明确，是使读者取娱并受到教益。这样，劝说术就与诗歌艺术的目的完全一致起来。此外，心理学和人性学的一些新理论似乎也证实了推理和想象在劝说中的主要职能。因此，在十八世纪，修辞学与文学评论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结合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英汉修辞比较研究》，48）

从以上所引论述及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修辞学的主要传统之一，是把修辞学看作口头对说艺术。西方这种修辞观与人们注重演说、擅长论辩的传统和社会风气有关。有无论辩能力被看作是有无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这些因素，论辩之风如此之盛就不足为奇了。

三、中国古代修辞学的附庸性与西方古代修辞学的独立性

中国修辞研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附于其他学科之下,作为文章学等的一个部分,因此中国“古代修辞学缺乏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遑论修辞学派了。修辞学的丰富资源是同文学、文章学、音韵学、训诂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的,它处于附庸地位。而且,有关修辞的论述往往夹杂在众多的文论、史论、经解、诗话、曲话、笔记、随笔之中,比较分散,呈现零珠碎玉的特点。”(陈炯:289)此段话可谓一语中的,纵观陆机的《文赋》,从文章学角度谈作文构思、谋篇时,多处谈及修辞要义,文辞体式、风格、文与质、音韵等诸多修辞问题。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凡五十章,三万七千余字,以长达五分之一的篇幅讨论修辞,所及之修辞问题如造词、句法、段落安排、文章总体结构、对偶、比兴、夸饰、事类、声律等修辞手法。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修辞研究大都是作为其他学科的附属部分进行研究的。

反观西方修辞学,尽管其有过不注重诚信这一流弊,但从学科建设上来讲,它从古希腊时候起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公元前五世纪柯拉斯创立了修辞学,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诡辩派代表人物埃苏格拉底斯创办了讲授修辞的专科学校,公元前四世纪末亚里士多德经过对修辞学所研究的问题的深入分析,撰写了一部西方最有影响、也是最为古老的修辞学专著《修辞学》(*Rhetorique*)。其后西方的修辞学家,大都是在这位巨人的研究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已。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是把希腊修辞学拉丁化的先驱之一。中世纪在修辞学方面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奥古斯丁。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研究进一步展开,且分为三大学派:传统派(Traditional School)、拉米斯派(The School of Ramus)和修辞学手段派(The School of Schema)。启蒙时期,西方修辞学有了新的特点,名称也因此改为新奇古典主义修辞学(Neo-Classical Rhetoric)。不仅学派和名称有所变化,修辞学的领军人物也时有代出:从十八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早期,先后有三位重要修辞学家及著作值得一提:坎贝尔(George Cambell)与其所著《修辞哲学》,布莱尔(Blair)及其所著《修辞学与美学讲座》,惠特利(Whetely)及其所著《修辞学原理》。简单回顾,已可清晰看出西方修辞学